

写给当代人看的罗马史：SPQR 读书笔记之三

熊莹

在受到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潮冲击的当今世界，罗马人对于“公民权”、“国籍”及身份认同的“超前”观念和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极为宝贵的样板和先例。古罗马之所以对今天来说仍然重要，“主要是因为罗马人的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仍被用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以及反思我们自身的一套语言和观念模板，从高深的理论到粗俗的喜剧……在此重要的是争议，而非解决方案”。

玛丽·比尔德的《SPQR：罗马史》呼应当下关切，现实感极强。书中鞭辟入里、令人拍案叫绝的高论迭出，作者思维的活跃性、对问题的敏锐性以及丰富的联想能力让人赞叹。有些问题即便没有给出答案（恐怕永远也不会有正解），其提出足以引人深思。就像比尔德在书中告诉我们的，西塞罗、撒鲁斯特、维吉尔、贺拉斯、李维和塔西佗等古罗马作家在创作时体现出了罗马人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和建构，那些所谓值得世代效仿的“祖先习俗”（*mos maiorum*）和“先贤言行”（*facta et dicta memorabilia*）、甚至共和国的基本制度架构，通通被投射和回溯到城邦初始的年代，用以论证和解释现在，为眼下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同样地，她自己的这部罗马千年史也渗透着对当今世界的困惑和焦虑。

奴隶，弃婴，瘟疫，斗兽场里的野蛮杀戮，酒神祭典上的纵欲狂欢，罗马世界看上去离我们是如此之遥远。然而有些东西又似曾相识，古罗马的回响于今天仍不绝于耳：罗马人自己对帝国统治的诘问，对革命、暴力和恐怖政治的回应，对一种崭新的公民权和国家概念的发明，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喀提林阴谋”引出了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讨论。身为执政官的西塞罗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动用“元老院紧急决议”所授予的便宜行事权、不经民众大会审判就处决喀提林派，这不禁立刻令人联想到“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对公民隐私和权利的侵犯和践踏。西塞罗处置喀提林的非常手段不但在当时的罗马人中间引发激烈争议，至今仍是困扰着我们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绕过法律程序处决即便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人是否合法？公民权利和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国家安全”而牺牲？罗马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军事干预的失利——公元前53年的卡莱战役（*Battle of Carhae*）就发生在如今动荡不安、“伊斯兰国”横行肆掠的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交界处，罗马统帅克拉苏的头颅被帕提亚人割下当作宫廷戏剧表演的道具。再有，已成为罗马帝国标签的“面包与竞技”映照出了现今西方福利国家的尴尬处境，它究竟是值得称许的最早的“国家福利”，还是像罗马讽刺作家讥讽的那样只是鼓励了懒惰奴性而腐蚀了民众的自由与政治活力？在受到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潮冲击的当今世界，罗马人对于“公民权”（*civil*

rights）、“国籍”（*nationhood*）及身份认同（*identity*）的“超前”观念和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极为宝贵的样板和先例。如果说广泛授予公民权，对奴隶、行省人和外邦人敞开大门曾经是罗马帝国崛起的秘诀，那么到了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在面对多瑙河沿岸如潮水般涌入的所谓“蛮族”时的消极抗拒以及与此同时东罗马的事不关己、以邻为壑，是否又是公民权政策的一种“倒退”？最后一个问题很难不让人将其同眼下欧洲的难民危机联系在一起——“这不禁让人觉得，罗马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某种翻版（*ancient Romans as some version of ourselves*）”。

或许有人会诟病作者太急于勾连古今，以致牵强附会。比尔德并非不知中间横亘着数千年的问题背后的本质差异，两者不可做简单类比。她自己也说，“无论罗马人对公民权的处理方式听上去如何地具有吸引力，照搬到今天无疑是愚不可及的”，“我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天真地以为，能够直接地从罗马人、希腊人或者其他古代文明那里学到多少东西”（535页）。

那么学习罗马史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和今天的世界究竟有何教益？古罗马之



罗马的克劳狄引水渠

所以对今天来说仍然重要，“主要是因为罗马人的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仍被用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以及反思我们自身的一套语言和观念模板，从高深的理论到粗俗的喜剧……至少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的许多有关政治权力、公民权利、自由、责任、政治暴力、帝国、奢侈、美、甚至幽默的最基本假定都是通过和罗马人及其著作的对话而形成并接受检验的”，“在此重要的是争议，而非解决方案。古罗马之于我们不是简单的教训，也并非我们应该顶礼膜拜的一种文明……罗马人争议的话题仍旧植根于我们当下，正如此前植根于我们先辈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后者反过来也给我们留下了他们自己的问题、解释和答案”，“无论美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对罗马人不公。而如果我们不严肃

郑重地对待它，则是对自己不公”（536页）。

比尔德提倡的是通过学习而实现的对话：“反思他们（罗马人）是如何感知和组织世界的，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即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例如民族国家——也只不过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罗马提供给现代人的与其说是学习的榜样，不如说是挑战，尤其对今天仍在为政治权力、自由、秩序、国家、族群与身份等问题争斗和困扰的世界来说。在比尔德的笔下，罗马永远是活生生的、能够唤起现代人无数共鸣的。她的这本书无疑重塑了我们对于罗马史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

◀（上接2版）

那么悬度之名又从何而来呢？

其实它是源于“印度”之名的一种异译。古人说“悬度、贤豆、身毒、天毒”等都是印度之名的一音之转，这句话也对，也不对。汉文资料里有两套关于印度的地名，分别是对属于伊朗语系统里 *Hōnduka/ Hōndu* 的汉字音写，如捐毒、悬度、天竺、痕都、印度，以及属于印度语系统中 *Sindhavah/ Sindha* 的读音记录，如身毒、新头、辛头、信图等。捐毒之捐与悬度之悬这两个字的声母分别为“喻”四等

（j-，发声相当于汉语拼音系统里的半元音 y-）和“匣”母（ɣ-），发音都与 h- 很接近；天竺之天可读作 *hen*，古人早已有记录；竺读若 *duok*，犹如茶字在闽方言里读 *tei*。古人搞不清这两组译名之间的关系，认为“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现在还有人据此主张“捐毒”应音读为“身毒”。那是欲益反损，其效果恰与坚持读吐蕃为“吐播”、读大月氏为“大肉氏”同。上述两组地名之间，若按名从主人的原则，就应以第二组的读音为正。可是最喜欢把与梵音不同的读法统统都叫做“讹音”的玄奘，在这里却有点糊涂

了，竟然认为前一组地名里的“印度”才是“正音”。

按现代地理学知识，若采取上述路线由北向南跨越兴都库什山主脉，那就要在经过达尔科特山口之后，才算抵达兴都库什山的南坡，进入广义的印度河流域范围，也就是进入了“印度”的地面。然而，唐以布路犍城置悬度州，表明当时人的观念有些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印度地面始于由连云堡或曰布路犍城、或曰婆勒城负责守卫的巴罗吉尔山口以南。称该山口为悬度，正因为它是从北方进入印度地面的最经常利用的孔道。

顺便说，向达译《斯坦因

西域考古记》，在谈及连云堡之战中的唐军敌方时，将原文中本来不错的“吐蕃人”改作“大食人”。向先生学力深厚，此殆一念之际错认远征连云堡为怛逻斯之战，故偶误耳。

唐朝和吐蕃的历史都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不可分割部分。两国相争，打仗打到了远在中国当代边界之外的南亚。唐前期武功的强大由此可见。这是讲述中国历史时无须回避的事实。不过或许也没有必要过度地赞叹这一类对外扩张的国家行为。相比之下，高仙芝统率下的这次艰苦卓绝的军事行动，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大大超出人的意

志和力量之天然限制的程度，倒更值得今日人们的敬佩和感动。我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高原上，遇见过一对年老的日本夫妻。他们再三再四地访问这里，就想“走一走高仙芝的大军当年可能走过的每一条路线”。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是“我们太喜欢高仙芝的浪漫主义”。天哪！高仙芝有那么“浪漫”吗？我后来想想确实如此：就竭尽全力去超越天性对于人自身所设定的极限这一层意义而言，高仙芝确实堪称“浪漫主义”的一个历史典范。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